童年：“每个人都有他的天然处所，不管是骄傲或价值都决定不了它的高度，决定的是童年。”

童年，作为一个人生命的起点，往往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萨特认为一个人主要可以由他的童年得到解释，因为其中已经孕育了他对人生的初步看法。对于自己的起点，萨特作了如下介绍：

> ……让一巴蒂斯特为了去看大海而预备报考海军军官学校。1904 年，这位已被交趾支那的热病折磨得异常憔悴的海军军官在瑟堡结识了安娜一玛丽·施韦泽，并征服了这位身材高大的孤单女子，随即与她结了婚。他匆匆忙忙就让她生了一个孩子——我，随后他便到死神那里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了。（《词语》，第 7 页，三联书店，1996 年版）

就这样，萨特开始了他的童年，没有任何选择，也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由于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只得带小萨特回到位于巴黎近郊莫东的父母

家里生活。在那里，萨特母亲的境遇并不好：“母亲为了取得家人的宽恕，不遗余力地干活。她先是在莫东，后来又在巴黎为父母管理家务。她既是家庭教师，又是护士，既是管家，又是仆人和女伴，但她仍未能消除她母亲心中的不快。……”（《词语》，第 9 页）与母亲的情况相对照，萨特感到“让一巴蒂斯特的死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重又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以自由。”（《词语》，第 9～10 页）他获得的是怎样的自由呢？

> 倘若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会整个儿压在我身上，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幸亏他年纪不大就死了。在一大群肩负着安客塞斯的埃涅阿斯中间，我则独自一人从此岸畅游到彼岸，我憎恨这些一辈子骑在他们儿子头上的不露面的传种的家伙。我把一个年轻的死者留在了我的身后，这个死者没有来得及做我的父亲，可他今天倒可以做我的儿子。这是件好事呢亦或是一件坏事？我不知道。但我很赞同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的诊断“我没有超我”。（《词语》，第 10 页）

没有超我，这就意味着在他上面没有专制的独裁者。没有人能够占有他，没有人会向他发号施令，没有人要求他必须服从，他是自己的主宰。不仅如此，没有超我同时还意味着，他的母亲是完全属于他的，没有人会因为他对她的占有而向他挑衅，他也不必为任何人对母亲的侵占而嫉妒。因此萨特说：“我那可悲的家境令人肃然起敬，并成就了我的骄傲自大。”他感到自己对自己有充分的主

权，他是完全自由的，“听家里人的意思，我好像是奇迹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死者的儿子，毫无疑问，我身上那种难以置信的轻松感盖源于此”。（《词语》，第 11 页）

外祖父对他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小萨特的骄傲感。萨特的外祖父查理·施维泽自己创办了一所语言学校，专门教授外国人学习德语，在语言教学方面颇有创见。他希望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人而未能如愿，因此，他把萨特的出现看作是命运对他的特殊恩宠。小萨特在他温暖的抚摸、痴痴的注视和温柔的呼唤中明显地意识到“他崇拜我！”。显然他是小萨特的实际供养人，但这个孩子是一件他随时可能失去的礼物，他不能占有他，因此，萨特在《词语》中回忆说：“我首先是通过现实那欢笑的松软性才认识现实的。我反抗谁？又反抗什么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将他的任性强加于我而成为我的法律。”（《词语》，第 15～16 页）他感到自己是绝对自由的，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不会有人限制他；他可以不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没有人会去强迫他。“总之，我尽量远离世俗的权力：我既不在它之上，也不在它之下，我在别的地方”。这样的自由感使童年的萨特兴奋、骄傲，也让他觉得世上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好：“那真是一个天堂。每天早晨醒来时，我都高兴得惊呆了，我赞叹那不可思议的命运竟使我生活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中一个最和睦的家庭里。”（《词语》，第 21 页）在这个生活被爱所充满的孩子的心目中，自己惟一应该做的事就是使人快活。

然而，就在小萨特沉浸在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中的同

时，随着生活的逐渐展开，他日渐清晰地感到失去父亲这个事实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另一方面的影响。他意识到，“每一个人，不管他如何高贵，如何卑微，都自有其在宇宙中被规定的位置；可就在这时候，属于我的存在理由却溜之大吉了，我突然发现我是不算数的，在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上，我为自己的奇特在场感到羞愧万分”。（《词语》，第 60 页）萨特感到，失去了父亲，自己在一定意义上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失去了必然性。这时他意识到，如果他有一个父亲，他会被给予自尊并在这自尊上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权利；如果他有父亲，他会因拥有了一个被决定的未来而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甚至如果他的父亲曾给他留下财产，他也可以作为房屋和田产的继承人而获得自己应向何处去的讯息。可是，什么都没有，他生来就不是任何人和物的主人，他生来就一无所有。无论是在外祖父家里还是后来在继父家里，他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在自己家里”，这使萨特看到自己存在的另一面。

> 这个世界的财富向所有者反映出了他是什么，而这些财富却告诉我，我不是什么。我既不是坚固的，也不是永恒的，我不是继承父业的接班人，也不是钢的生产所必须的：总之，我没有自己的主心骨。(《词语》,第 61 页)

虽说有人供养他的生活，有人照顾他的起居，他从不必为自己的生计担心，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是无根的、偶然的、抽象的人。

偶然性是萨特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在童年时代，萨特不仅在失去父亲方面体会到它的意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感到它是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几十年后，萨特仍能记得童年的一次经历：

> 母亲领我到卢森堡公园去，和全家怄气的埃米尔舅舅突然冒了出来，他忧郁地看着他的妹妹，冷淡地对她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看小孩”。他还解释说，我是家里惟一清白无辜的人，因为只有我从未蓄意冒犯他，也没有根据风言风语去指责他。我微笑了，这是我的威力，为我在这个忧郁的人的心中燃起的爱而感到局促不安。但兄妹俩已经开始讨论他们的事情，各自诉说心中的不满。……而坐在他俩的铁椅之间的我则早已被遗忘了。……（《词语》，第 59～60 页）

本来，在小萨特看来，在他母亲、舅舅和他三人中，他应是主角，大家的行为都应是以他为中心的。而事实上，他几乎被另外两人完全忽略了。这使他意识到他是人生戏剧中的“假主角”，他在戏台上忙忙碌碌，但戏中却没有属于他的故事，他已被虚无化了。他明白了，“我只是造成他们不和，他们和解的一个偶然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则在其他地方”。（《词语》，第 60 页）

他的出生是偶然的，他的存在是偶然的，甚至他造成的影响也是偶然的，一系列的偶然性使小萨特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若要我感觉到我是必然的，那就必须有人需要我。有一段时间，家里人就让我陶醉于这种幻想之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说，我是上天恩赐的，为人所盼望的礼物，对我外祖父和我母亲来说，我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再也不相信了，但我依然保留了如下看法：即除非一个人是为了满足某种期待而专程来到这个世界，否则他生来就是一个多余的人。那时我是如此骄傲，又如此痛感我的被弃，以致我希望为整个世界所需要，否则我宁愿去死。(《词语》,第 117～118 页)

孤独，是萨特从童年就体会到的又一种存在。这首先来自于他对外祖父家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在自传体小说《词语》中，萨特提到了外祖父与外祖母之间的冷漠关系，提到外祖父和他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疏远和敌对情绪，也提到外祖父、外祖母对重回娘家的萨特母亲的勉强态度。这一切使幼小的萨特感到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任何人都无法和其他人同心，人是孤独的。萨特对孤独的体验还来自于他自身的处境，由于外祖父的资产阶级的傲气，他的童年没有同龄的玩伴，全部生活都是在同“一个老人和二个女人”的家庭演戏中度过的，在善意的欺骗中，他是个“假孩子”。

我过着两种生活，两种虚假的生活：在公开场合，我是一个骗子，是著名的查礼·施韦泽的

有名的外孙；而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又在想像中陷入怨天尤人的泥潭。我以隐姓埋名的虚假身份来纠正我的虚假的荣耀。我毫无困难地从一种角色转入另外一种：就在我要秘密地进行突然袭击时，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母亲的手突然瘫痪了，在琴键上僵住了，我赶紧把戒尺放回书橱里，飞快地奔过去，扑到外祖父的怀里，把他的座椅推到他跟前，并给他拿来翻毛拖鞋，问他一天来的情况，还叫出他那些学生的名字。不管我陷于这种梦幻有多深，我决不至于迷失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不过我也受到了威胁：我的真实很可能直到最后仍然是我那些交替进行的欺骗行为。(《词语》，第 94～95 页)

在家庭演戏中，欺骗和自欺交替进行着，而挥之不去的是他那份极力遮掩的孤独。

要是我能够相信家庭表演的话，那么我就纯粹是一个客体，是一个典型的受虐狂。然而没有，家中的表演仅仅影响了我的外表，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是冷静的，无法辩解的；我害怕体系，痛恨那种欣喜若狂的痴呆，痛恨被抛弃以及这个被抚摸、亲吻得发腻的身体；我在与自己作对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我投身于骄傲与虐待狂之中，换言之，也就是投身到慷慨之中。如同吝啬或种族主义，慷慨也只是为医治我内心的创伤而分泌出的香脂，可最后它却使我们中毒身亡：为了逃

> 避创造物的被遗弃的困境，我为自己制造了最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孤独——造物主的孤独。不能把这一转向与真正的反抗混淆起来，真正的反抗是起来反抗虐待者，可我只有恩人，而且在很长时期内我一直是他们的同谋。(《词语》，第 79 页)

在欺骗与自欺的生活中，童年的萨特只有把内心真实的愿望寄托于想像中，他在梦幻中开始了真正的行动。在他的幻想中，他是一个勇敢的、战无不胜的自由战士，是一个人们期盼着的、肩负着某种独一无二的重大使命的使者，是一个出色的冒险家，乐于助人的游侠骑士……为了不使这美好的幻想撞碎在坚硬的现实之上，萨特赋予了自己成为作家的使命。这是一种新的自欺，也是一种新的自救。

少年：“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和写作哲学，我认为文学的目标是写一本书，对读者展示他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

1917 年 4 月，在萨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母亲改嫁了。这给幼年的萨特心灵深处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称 1917 年 ~ 1920 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三四年”。

在萨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他曾说过失去父亲的事实使他可以平静地、完全地占有母亲，并提到他和母亲之间的默契。

> 母亲和我像是同年龄的人，我们谁也不离开谁。她称我是她的男伴，她的小情夫，我也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她，我已停止的写作变成了我嘴里没完没了的絮叨。我叙述着我的见闻以及安娜一玛丽的所见所闻，还有房屋、树木及各种人事。为了能快乐地告诉她这一切，我倾注了我的感情……我们有自己的神话，自己的说话方式，以及自己经常开的玩笑。……在大庭广众面前，

我们配合默契，只须眼睛一望就足够了。（《词语》，第 156 页）

与母亲的密切的感情联系造成萨特的“恋母情结”，他把母亲看成自己最亲近的人，他甚至想“我以后一定要娶她为妻以便保护她”。因此，母亲的再嫁在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母亲的改嫁使我割断了与她在情感上的内在的联系，我感到她已经背叛了我，尽管我没把这种想法告诉她。”（《爱情和思想》，第 37 页）

萨特的继父约瑟夫·芒西是一位船舶工程师，后来成为拉罗舍尔船舶修造厂的经理。他相信科学，而对萨特热衷从事的写作则不屑一顾。他和萨特无论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性格、爱好上都是相互抵触的。萨特承认他很聪明，但指出，“他是另一种思想，跟我的不同，他没有要点，但我不能说那时他的思想已经走人歧途。他谈到数学、物理学、技术知识和工厂发生的事。他有一个完全组织化的世界。他读的书都没有什么趣味，但在当时却很有名气”。“他认为一个人在 14 岁时不应该打主意去搞文学。在他看来那是无意义的。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这种人，三四十岁，写了一定数量的书。但一个人在 14 岁不可能干出什么名堂来。”继父希望萨特能从事科学工作，而萨特却决意以写作为生，情感上和思想观点上的不一致，使得他们虽然维持着表面的正常关系，但内心里却有着根本的敌对情绪。“他知道我在写，但他一点也不关心。而且这些作品不值得任何人注意。但我知道继父不关注它。也就是说，实际上我总是为反对他而写作。我的整个一生

都受此影响。写作就是反对他。他不责备我，因为我太年轻——我做这事获得的自由比玩棒球还多——但事实上他是反对我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永别的仪式·同让一保尔·萨特的谈话》，第 162-163 页）

在拉罗舍尔，萨特相继读完了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他的生活是在继父的直接支配之下度过的。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但他却对文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书，主要是游侠小说、流行小说、惊险故事。他还结合自己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观察和体验，构思了他将要写的小说《猫头鹰耶稣》的主要故事情节。故事以第一人称展开，讲的是一个矮小的外省教师的一生，“这是通过一个学生的眼光看的。小说的主人公真有其人，拉罗舍尔中学的一位老师，他曾请我去过他家。我想像他的葬礼，而这一年他真的死了。孩子们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然而在我的故事里他们参加了”。在故事中，萨特揭露了一个孩子眼中社会的丑恶和不公。就在萨特慢慢地适应了拉罗舍尔的一切时，1920 年，他被母亲从拉罗舍尔送回巴黎，他向我们解释了这一变化的原因：“我是由于外祖父——一个德文教师——而去巴黎的，他在那儿有些同学当校长，他想给我找一个好学校；他要让我从令人发指的违法行为中转变过来，我在前一年因偷家里的钱同卡迪洛一起成了罪人”。（《永别的仪式·同让一保尔·萨特的谈话》，第 169 页）

在巴黎，萨特在亨利四世中学上一年级。在那里，每周“有六天我在中学睡，从不离开学校，作为一个寄宿

生，在这些晚上就有那些陌生的人际关系。然后，星期天我回到外祖父家。这是一个跟我父母亲的家完全不同的天地，因为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教师。我又回到他的藏书室，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在外祖父家里，他可以读到很多的书，这里有《悲惨世界》、有《包法利夫人》、有法朗士的长篇小说……这些书使萨特知道，文学并不只是他在拉罗舍尔读到的游侠故事和惊险小说，还有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使他懂得，“我应该像实际看到的那样来谈论人们”。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他开始写作在拉罗舍尔构思的《猫头鹰耶稣》。这篇小说于 1923 年在《无题杂志》上公开发表，萨特把它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在萨特的印像中，寄宿生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但他却把回到巴黎看成是自己的幸运。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他又一次遇到了童年的校友尼赞，并和他开始了比以前亲密得多的友谊关系。另一个原因是，作为寄宿生，他们晚上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亨利四世中学，他和尼赞常去看望一些他们认识的高年级的学生，和他们交谈，并把他们的书借来读，这些书主要是一些严肃的读物，萨特对古典文学更感兴趣，而由于尼赞的影响，他逐渐对普鲁斯特、康拉德、吉罗杜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也有了较为深人的了解。普鲁斯特是萨特喜欢的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寻求失去了的时间》尤其令萨特着迷。在书中，普鲁斯特描述了主人公在存在中发现“自我”以各种形式体现于他自身的过程，由于他体验到了消除忧郁和焦虑时刻的真正奥秘，为了重新找回这一时刻，他试图消除日常生活中和潜

意识中的那些杂乱的信号。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容。在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谈话中，萨特提到普鲁斯特对他的影响。

> 我开始喜欢普鲁斯特的主要是关于世界的事。这是逐渐产生的。后来我也想到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但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和写作哲学，我认为文学的目标是写一本书，时读者展示他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的理想——我要成功地说出有关世界的事情，不是任何人都能发现它们的，但我将看到这些事情。我还不知道它们，但我会看到它们的，而它们将展示世界。(《永别的仪式·同让一保尔·萨特的谈话》，第 157 页)

由于认识到哲学对文学的重要性，萨特在亨利四世中学选择了哲学班，对于这一选择的原因他解释说："在我看来，一旦你懂得怎样去从事数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这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全部自然科学和数学，我想，如果我专门研究哲学，我将学得世界上的一切，我将在文学中谈论它们。可以说，这给了我内容。"既然哲学可以让人了解一切，而文学又应该如实地说明世界，那么，萨特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一种必然："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我认识到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成了对作家的根本要求。"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班，萨特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对事物的观点，并且在头脑中构想了一大堆观念，他希望自己能以文学方式对这些观念加以传达。"那时我不想写

哲学书，我不想写类似《辩证理性批判》或《存在与虚无》那样的东西，我想让我相信的哲学和我要获得的真理在我的小说中得到表达。”

顺利地通过了第 1、第 2 场中学毕业会考之后，1922 年 9 月，萨特和尼赞一起进入巴黎路易大帝中学的文科大学预备班，在那里准备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在此期间，除了《猫头鹰耶稣》以外，他的另一篇小说《病态天使》也获公开发表，萨特说，“这仍然是我对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环境的描写。”因此，它也是现实主义的。这两篇小说可以说是萨特最早发表的作品。1924 年 6 月，他在全国会考中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

高师期间：“高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我自己，从第一天起，就是独立的开端。”

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萨特始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验着世界，并逐渐对世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他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不断趋向成熟，这些认识几乎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活动。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一所古老的名牌高等学府，曾培养出许多法兰西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等。巴斯德、柏格森、丹纳、马勒博朗士、罗曼·罗兰等都曾就读于该校。与萨特和尼赞同时入学的还有后来成为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的雷蒙·阿隆，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达尼尔·拉加斯，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乔治·伯利茨。因此，巴黎高师又被称为“法兰西近代思想家的摇篮”。

来到巴黎高师，萨特呼吸到的是更加自由的空气，“高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我自己，从第一天起，就是独立的开端。许多人都会像我这样说，他们在那里的四年是幸福的”。(《境况种种》，第 6 卷，第 149 页)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开始了。在这里，萨特以惊人的毅力研读了

大量的哲学著作；柏格森、笛卡儿、马克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霍夫曼斯塔尔、司汤达、卢梭等人的著作都成了他研究的对象。

20 世纪 20 年代，柏格森在法国哲学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柏格森的哲学又称“直觉主义”。他认为，世界万物的真正本原不是物质，而是一种纯粹意识，而直觉就是对这种纯粹意识的“体察方式”。他指出：“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第 3～4 页)他认为纯粹意识是流变的、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即他所说的意识的“绵延”，这种“绵延”是不能循环，不能预测的，同时又是不受时间、空间约束的，因而它是绝对自由的。意识绵延的原动力就是生命冲动，它是宇宙万物之本，直觉是认识万物真理的惟一途径。柏格森曾在巴黎高师任教，他的学说对萨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书使萨特感到“哲学真是了不起，真理是从天上降落人间的，而这种技巧——哲学，就是要使更多的真理从天上降落人间”。他曾以柏格森的“绵延”学说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并受到指导教师的好评。柏格森哲学中对时间、空间、自由、行动等含义的理解也对他以后的哲学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笛卡儿的哲学对萨特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说过：“由于笛卡儿，我相信：我思，故我在。”另外，叔本华和尼采对于理性、道德的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对人的存在的思考，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对

理性、权威的蔑视。而霍夫曼斯塔尔的浪漫主义文艺理论又使他对文学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尼赞的影响，萨特也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他承认他“没有读懂它们”，他“没记下什么，我看不出这些著作有什么意义”(《七十岁自画像》《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01～102 页)

1926 年，萨特在巴黎高师获得学士学位和哲学高等学业毕业文凭。他在巴黎高师后两年的任务是为取得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作准备。为此，萨特选择了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曾强烈地吸引过他，特别是其中对潜意识的分析和对梦的解析，他认为“性别与思想是相互影响的，正如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的那样，精神分析学极大地开拓了心理学的范围,可它今天还不大为人所知”(《与萨特相见》《文学报道》，1951 年 2 月 1 日)在研究精神分析学的过程中，萨特也意识到这种学说的局限，他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一大失误在于它过分夸大了性的重要性。

像命运对古希腊人的重要性一样，偶然性是萨特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东西。童年时代他已对此有所体验，在文科预备班时他又在自己的第一个哲学笔记本——“米迪栓剂”中首次暗示了这一观念。他谈到“我关于偶然性的观念的起因是很奇怪的。我开始想到它是由于一部电影。我看的电影中并没有偶然性，而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发现了偶然性，因此，电影的必然性使我在走出电影院后，感到大街上没有必然性，人们到处走动，他们是普普通通